

近代早期^① 西欧天主教改革成因浅析

——“反宗教改革”再审视

韩福秋

(南昌航空大学 江西 南昌 30063)

[关键词] 天主教;教会;社会;信仰

[摘要] 本文对近代早期天主教在权力组织结构、教会神职人员的道德风尚、普通信徒的宗教需求与教会教义之间存在不协调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在面对近代早期西欧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出现的种种变动的新形势下,天主教对自身进行改革以适应时代的历史必然性。

[中图分类号] K5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12(2007)04—0018—05

Analysis on the Causes of Catholic Reformation in Early Modern Western Europe
—A reassessment of Counter-Reformation

HAN Fu-qiu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63, China)

Key words: Catholicism; Catholic Church; society; belief

Abstract: In this thesis, focusing on the power system of Catholicism, the moral situation of clergymen, the discord between the religious need of common believers and doctrines of church,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problems faced by Catholicism in early modern, pointing out that in facing the new situation following the transition in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Western European society, the Catholicism must reform itself to fit for the need of Era.

1545至1563年,在意大利北部濒临德意志的边境小城特伦特,天主教会召开了第19届公会。“在十八年中,主教会议缓慢而稳定地对教会进行了深刻的改革。”^[1]作为天主教历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公会,特伦特公会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由于1517年,马丁·路德首倡的教会改革(后来分化为抗议宗、归正宗、安立甘宗等一系列派别,在我国史学界被统称为新教),被不恰当地专称为“宗教改革”(Reformation)运动,故而对天主教在近代早期行为的认识,在史学界一直存在严重的分歧。许多学者将天主教的行为看成是对新教“宗教改革”运动的一种被动的、敌视性反应,因而将其称为“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作者认为,固然,新教宗教改革的存在,对天主教会的行为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客观上对天主教改革(Catholic Reformation)加速进行起了推动作用。但近来研究已经揭示出早在路德之前,自发的教会改革行为已经出现在天主教世界的各个地区,并缓慢但稳定地在教会内部提升,特伦特公会不过是对这种改革行为的汇集、凝聚和提升。而马丁·路德,在肇始后来被称为“宗教改革”运动的最初也是一名对天主教信仰怀有深刻热忱的虔诚教徒这一事实,也可证明天主教改革不仅仅与新教的改革运动紧密相连,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对天主教改革的深层原因进行深入探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知宗教史上的相关问题,而且对我们客观地认知西方文明史也大有裨益。

1 权威的丧失:日益衰弱的教会威望和控制力

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最响亮的声音莫过于要求天主教“从头到脚,从仪式到信仰”进行改革的呼声。而与这一呼声紧密相连的对于教会及其成员的无尽诟病也表明,教会的威望正在失去原有的感召力。

[收稿日期] 2007-09-05

[作者简介] 韩福秋(1975-),男,黑龙江省讷河市人,南昌航空大学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世纪史。

①15-18世纪在史学界被看作西方文明的近代转型期,这一时期,西方学术界称为“Early Modern”,在我国当代史学界被译为“近代早期”。

教会在道德风纪上遭到普遍的谴责。这一时期,在神职人员中,对信仰无知以及偏离信仰的行为不胜枚举,对此,“任何一个认真的历史学家都不会否认这种弊端的存在。”^[2]而这与盛行于教会内部的神职人员不驻地和兼领圣俸现象紧密相关。在米兰,卡洛·巴罗米奥入驻之前,无驻地主教的历史已长达80年。而“在法国森梓(Sens)主教区,在1495年,在所有对教区负有责任的人中,60%以上都不在自己的岗位上。”^[3]缺少了约束,风纪荡然无存。各种腐败堕落现象应运而生,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相当多的教士和僧侣出入小酒馆、妓院,勒索钱财,甚至公然违背独身誓约,公开或隐蔽地蓄养妻妾、生儿育女。在这一风气肆虐之下,教皇也不例外。“在新教革命前统治了二十五年的英诺森八世据说有八个私生子,其中有几个是他当选教皇以前所生的。”^[2]这一道德现实,使虔诚的天主教世界的信徒产生了幻灭感,由之产生了净化教会的愿望。

教会本身的表现也令人失望。这既与现实中的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也与教会过往的历史有着必然的联系。教会的“巴比伦之囚”^①以及随之而来的教会“大分裂”^②是其最主要的诱因。“巴比伦之囚”使教会脱离了其精神之源——罗马;而教权“大分裂”所造成的两个、甚至三个教皇在数十年之间的谩骂和争夺更是幻灭了教会只有一个、圣彼得的继承人只有一个的神圣信条!不仅如此,“一直延续到1449年的罗马天主教的分裂产生一个后果,他削弱了教会的所有戒律,从而导致各级教士道德的败坏。”^[4]这一切极大地削弱了教会在虔诚信徒心目中的地位。

教会的声望并没有因大分裂的结束而得到有效的恢复。返回罗马的教皇们没有如人们所期盼的那样,全心全意地将自己的精神奉献给信仰,而是更深地卷入世俗争斗之中。教会大兴土木、培育人文主义精神,教会的世俗化日益加深。人们渴望的“纯洁”教会似乎越来越遥远,这不能不加深早已孕育的不满和愤懑。与此同时,教会的社会控制力越来越受到限制。在内部,结束教会大分裂而兴起的公会议主义(Concilism)思想并没有因为教会重归罗马而消散,反而因此树立了崇高的威望,成为一把双刃剑,与教皇的权力展开无休止的对峙和争夺。这对于急需一个稳定的权力中心来对教会的威信和控制力进行恢复的天主教会来说,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公会议主义者所宣扬的权力来自基督,高于教皇的思想受到此后历届教皇的嫉恨和抵制。教会内部权力的分散和争夺是教会难以对社会变动做出有效反应的一个重要原因,它阻碍了有助于恢复教会威信的几乎一切努力。

在外部,民族国家的意识随着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而逐渐强大,教会对社会的控制力大不如前。在延续千年围绕着主教叙任权、对神职人员征税权以及司法审判权的教俗争夺中,世俗君主逐渐居于上风。在这一争夺中,借助于教会内部权力的分裂,各世俗君主与公会议主义者互相借助,最终迫使教皇放弃了越来越多的权力。中世纪教皇通过一纸敕令就可以决定一个王国事务的行为现在已经不可想象!在政教关系不甚明确的中世纪晚期,这意味着教皇对于本属于宗教的事物丧失了至关重要的决断权。在事关教会的重大问题上,没有世俗君主的首肯和支持,教会将步履维艰。

上述事实已足够促使人们提出改革的要求,但却不能解释一切。教俗双方仍需彼此依赖,事实上,通过签订妥协性协定,双方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尚能够合作愉快。腐败和权力滥用问题对于教会来说并不新鲜,存在于普通信徒和神职人员中的对信仰的无知和迷信现象已经存在了多个世纪,但这一切在过往的世纪中并不必然影响教会正常发挥自己的功能,更不曾导致教会的大分裂。虽然天主教会存在种种弊病,教会这台庞大的机器似乎仍能有效运转。“并没有迹象显示教会对自己职责的履行完全不负责任。在天主教统治的中心地区——西欧,既有的宗教组织继续发挥着自己的功能。”^[5]能够对现实进行解释的,只能是现在受教育者和大众思想的主导者们看待这一状况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除了在教会组织机构中存在的原因以外,更主要的是人们对教会的期望值此时变得更强。“这种教会形象掩盖下的是人们急迫的信仰渴求。”^[6]而这只能从这一时代人们的信仰中去寻找原因。

①原指公元568年,新巴比伦王国尼布甲尼撒二世攻陷耶路撒冷后,将犹太人作为俘虏囚禁于帝国首都巴比伦城及其附近的行为。这里指的是1305至1377年,教廷迁居法国南部阿维农这一事件。因教廷受到法国的控制,故有此一比。

②指自1378至1415年间,天主教会分裂为两个、后来是三个教皇和教廷,彼此各有支持者并互相对立这一事件。

2 动荡中的狂热:现实苦难激发持续高涨的信仰热潮

“堕落的教皇主宰着神学上已经破产的教会,向无知和盲从的人们不停地叫卖一种假冒神学的迷信……”^[7]中世纪晚期的教会历史常被描绘成一幅暗淡的图景。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却得出了大相径庭的结论:“前宗教改革时代的教会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它的对手所批评的那样是‘信仰的沙漠’。”^[3]事实上,在中世纪晚期,天主教会面临的不是对信仰衰落的担忧,而是对信仰热情的持续高涨所造成的压力的兴奋和紧张。而这种信仰的现实与这一时代西欧社会所经历的痛苦嬗变紧密相连。

用“变动”来形容这一时代在当时人的思想中的印象似乎再贴切不过了。与以往相比,一系列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新事物逐渐浮现出来。民族国家兴起伴随着君主权力的提升,其干预社会生活的能力和频度持续增强。为争夺领土和财富而频繁发动的动辄数万、数十万军队的战争,无论规模还是破坏力都非以往时代那种参与者只有数百、数千人的战争可比;资本主义兴起使商品经济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而经济的持续变动更是将其影响力伸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即使是最遥远的乡村。在近代早期,货币贬值、物价上扬,尤其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的价格一路飙升;人口持续膨胀,对依然处于传统生产模式下的社会造成强大的压力,而新的经济形势和运输条件又给人口的频繁而大规模的流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大规模的人口涌向日益兴起的城市,空间狭小的城市因充塞了数量巨大的人口而膨胀起来(到16世纪,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从原来5个增长到11个)。海外“新世界”的发现和获得是伴随着东方“旧世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1453年陷落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手中)的毁灭和异教徒冷酷推进的现实而进入天主教世界的每一个信徒心中的。临近中世纪晚期,瘟疫复起,梅毒盛行,全欧范围的农业歉收,随之是绵延的饥荒。变动同样出现在思想文化领域。肇始于意大利半岛的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运动不断向深层次发展并越过阿尔卑斯山,成为一场全欧洲的思想文化运动。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改造的与其说是人们的思想和世界观,不如说是对新思想和新的世界观的日益提升的关注和思考追求。不安和骚动孕育在社会中,整个社会充满了剧烈的动荡,社会秩序时时面临着挑战。“第一次,在西欧大多数国家的历史上,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付费警察被接受。”^[8]

在这个充满危机的时代,各个阶层人们的生活都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更是被置于苦难和死亡的边缘。在这个时代“三分之二的儿童活不到十岁,大多数的成年人挨不到四十岁。”^[7]“死神之舞”到处展现,对死亡的恐惧牵动着每个人的心弦。现实中的苦难既然无法在现实中得到解决,自然会内化到精神层面中,为此,宗教及其载体天主教会就成为寻求心灵寄托的人们的关注焦点,人们迫切期盼教会能为自己带来对现实困难的解释和慰藉,对信仰的依赖和探寻日益深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可以失去的东西,便不值得期盼。操操心想象那永恒之事吧!向往天国吧!在人世间,只有那些鄙弃人间之事的人才会幸福!”^[9]宗教信仰方面的书籍广泛流行,如《基督的生平》(Life of Christ)、《效法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等广受欢迎。对于不识字的人们,则可以通过遍布街头、悬于厅堂的各种宗教雕刻和图画来慰藉自己的宗教情感。而对于圣徒遗迹的崇拜和对他们遗留下来的物件的近乎疯狂的收集也并不能简单地用“迷信”二字涵盖。虔诚的人们按时参加弥撒、祈祷、忏悔。在圣餐中,人们相信基督的真实临在,相信酒和饼经过神职人员的祝圣变成了基督的血和肉。“随着市民阶层财富的增长而不断上升的捐献潮流,配有贵重的雕刻祭坛和还愿匾的教堂的豪华装饰、未被授予圣职的修道士在数量和规模上的增长——这一切都是向着广度和群众性发展的虔诚需要的证明。”^[10]

所有迹象显示,16世纪晚期,宗教经历的不是衰退,而是一次令人瞩目的复兴。而这一复兴与这一时代所提供的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不深入理解发生于这一时代人们所处社会的现实,是很难对这一狂热的信仰冲动有清晰的认识并在情感上予以理解的。因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生命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11]总而言之,这一时代的信仰不是过少而是过多了,以至于教会不堪重负!

3 酝酿中的裂变:混乱的神学与获得救赎的确证间持续增强的张力

对此生的厌倦使得对来世的向往日益提升,从而加大了对获得救赎的渴求,对天主教会的依赖增强,在宗教信仰上探求加深。在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中,渴望在救赎上获得确证的人们对信仰的不懈探求,既受到教会现有的信仰模糊状态的阻隔,又使信仰中本已存在的混乱状态更趋于恶化。由此,对教会的现状充满了不满,强烈要求教会进行改革。并在宗教实践中酝酿出对教会正统信仰的偏离趋向。

教会的信仰从来不是同质而明确的事实成为诱发混乱的根源。传统的天主教信仰事实上不过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的一个信仰的大容器。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中,各种彼此相异甚至相互矛盾的信仰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存在的合理依据!虽然在过往的历史上也曾经因为信仰的分歧而在教会中引起混乱、争斗甚至酝酿成类似法国阿尔比派一类的悲剧,但在一个人们生存空间受到阻隔,因而缺少有效的联系和交往的社会里,加之教会的强有力的现实控制,这种主要存在于地区之间的信仰差异并不必然引起混乱。但到中世纪晚期,情况却变得迥异。随着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变动愈来愈剧烈,人们之间的交往愈来愈频繁和密切。在实现以经济为主干的各种社会联系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尤其是备受人们重视的关于宗教信仰的不同观念和现实也展开了激烈的碰撞和争斗。城市这一载体因为接受了越来越多的来自各个不同空间的人们,逐渐成为思想进行交流和碰撞的舞台。后来作为新教运动中心的斯特拉斯堡、苏黎世、日内瓦、维登堡,天主教改革的中心罗马、科隆的情况就是如此。

在这一背景下,信仰崇拜的形式开始在量上无限增加。各种形式的圣徒崇拜获得前所未有的地位和影响,其中,作为基督母亲的圣母玛丽亚成为竞相追逐的崇拜对象,其影响程度甚至超过了耶稣基督本身!而圣约瑟这个在以往仅仅带有小丑意味的滑稽人物,也日益被提升为一个善良、宽容和富于爱心的慈父形象而被寻求保护的人们顶礼膜拜!“蕴含在中世纪灵性活力中的倾向,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是如此之多以至很难对之进行有效的归纳,其指向也是纷繁的。”^[5]这毫无疑问增加了教会信仰中原已存在的混乱,并加大了教会管理的难度,从而在事实上使天主教的信仰仪式处于某种无政府状态之中。

在混乱的信仰形式中,偏离教会正统信仰的崇拜及其实践获得了迅猛的增长。信仰被许多信徒赋予了功利性的目的,异教和迷信的成分日益丰富,人们希望通过对特定信仰对象的崇拜获得某种物质性的保护。各种巫术和迷信思想混杂在人们的信仰中,积极而活跃。炼金术和占星术受到追捧。关于世界末日的说教和救世主即将来临的种种预言等神秘主义盛行,并拥有大批的信奉者。“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就将自己看成是上帝所派遣来对教会信仰进行干涉、对信徒进行拯救的人,而同时代的新教运动的相当多的支持者也是从这个视角来看待路德和他所倡导的改革运动的。“尽管教会为大众想象力提供了如此丰富的营养,但她却不能声称要把这种想象力控制在一个健康的、基督虔诚的界限之内。”^[6]

人们试图在信仰中找到一种获得救赎的确信,探寻逐渐深入到教义神学领域,从而加大了信仰混乱的深刻性。在复古主义成为时尚的社会形势下,人们天真地认为,越接近事物的源头,就越接近事物的本质,信仰问题更是如此。基于此,对教会早期神学经典和作品的研究日益兴盛。其结果是基督教早期的教父,如哲罗姆(Jerome, 340—420)、彼得郎巴德(Peter Lombard, ?—1160)、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 ?—1349?)等为数众多、观点迥异的神学思想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复兴”,并展开了持续不断的争夺。在这为数众多的对人们的“灵魂”进行争夺的神学思想的碰撞中,兴起于西班牙等西南欧国家的托马斯(Thomas Aquinas, 1225—1274)神学与流行于这一时代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神学日益取得了凸现的地位。这丰富的神学为后世打破了罗马束缚的各个新教派别提供了自由发挥的空间,也为新教各个派别之间的分歧买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教会神学经典的研究风潮下,对《圣经》的研究和阐释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圣经》已不再仅仅属于高级神职人员和学者们的专利,对于普通的信徒而言也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因为各主要方言版本《圣经》的出现,使得对普通信徒来说原本不可跨越的语言障碍正在消失。早在路德翻译的德文版《圣经》出现之前,各种方言版本的《圣经》就已经出现在西欧各主要国家了,如克莱特(Colet)的英文《圣经》(新约部分)、兹米尼斯西·斯内罗斯主持翻译的西班牙版《圣经》。这使得以往只是在教会上层和各大

学中进行探讨的深奥的神学问题,现在大规模地流行于社会上,为人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对其进行阐释和解释提供了可能。而民众文化水平的低下,在炽热的宗教热情的刺激下,自然导致这种解释充满了偏离正统信仰的风险。安全阀门到底在哪里?对获得救赎充满了渴望的人们,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状况,内心充满了浮躁和焦虑。所有的目光都指向了教会,“人们普遍地对基督教产生了一种新的渴求,希望基督教能在变化了的社会条件下满足人们新的精神需求,而基督教的教义并没有适应这种变化,使人们产生了信仰危机。”^[12]

中世纪晚期,西欧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内发生的深刻变动,对天主教会这个传统的组织机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整肃神职人员的道德风纪,改革教会的行政组织系统,树立强有力的权威;抛弃世俗的政治考虑,将教会的注意力回归到纯粹的精神领域,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结束存在于信仰领域内的混乱状态,使信仰明晰化、正规化,给处于苦难和迷惑中的信徒以确信和指导成为教会能够适应时代需求的客观选择。在教会内部,自发的改革行为早已展开,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出于对天主教权力机构的态度不同,逐渐产生分化。受到正统信仰排斥和打击的部分,转而采取了与正统教会断然决裂的激烈方式,从而肇始了波澜壮阔的“宗教改革”运动,并建立了属于自己“信仰”的“新”教会。受到新教“宗教改革”的刺激和威胁,留在教会内部的改革逐渐加速上升,成为整个教会的官方行为,以特伦特公会的召开为顶峰,实行了令人激赏的天主教改革。这次改革适应了时代变动的需要,使教会在新的形势下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

[参 考 文 献]

- [1] 米盖尔·皮埃尔. 蔡鸿滨、王文融等译. 法国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165.
- [2]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 罗国经译. 世界文明史·第二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183.
- [3] N. S. Davidson,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7. p. 21. p. 5.
- [4] [英] 托马斯·马丁·林赛. 孔祥民、令彪等译. 宗教改革史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122.
- [5] R. N. Swanson. "the Pre-Reformation Church" [A], in Andrew Pettegree ed., *the Reformation World* [C],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5. p. 10. P22.
- [6] [荷兰] 约翰·赫伊津哈. 刘军等译. 中世纪的衰落 [M].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7. 163.
- [7] Martin Jones.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6.
- [8] Peter. J Klassen. *Europe in the Reformation* [M]. London: Prentice-Hall, Inc, 1979. P. 6.
- [9] [德] 爱德华·福克斯. 候焕阁译. 欧洲风化史·文艺复兴时代 [M]. 沈阳: 辽宁出版社, 2000. 110.
- [10] 瓦尔特·彼得·福克斯. 宗教改革时代 [A]. 马克思·布劳巴赫等著. 陆世澄, 王昭仁译. 德意志史·从宗教改革之专制主义结束·上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35.
- [11] 马克思. 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 [M].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200.
- [12] 王新中. 对欧洲中世纪天主教改革性质的理论思考 [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1): 99.

作者: [韩福秋, HAN Fu-qiu](#)
作者单位: [南昌航空大学, 江西, 南昌, 30063](#)
刊名: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 卷(期): 2007, 9(4)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15条)

- 15-18世纪在史学界被看作西方文明的近代转型期,这一时期,西方学术界称为“Early Modern”,在我国当代史学界被译为“近代早期”
- 原指公元568年,新巴比伦王国尼布甲尼撒二世攻陷耶路撒冷后,将犹太人作为俘虏囚禁于帝国首都巴比伦城及其附近的行为.这里指的是1305至1377年,教廷迁居法国南部阿维农这一事件.因教廷受到法国的控制,故有此一比
- 指自1378至1415年间,天主教教会分裂为两个、后来是三个教皇和教廷,彼此各有支持者并互相对立这一事件
- 米盖尔·皮埃尔.蔡鸿滨,王文融.法国史 1985
-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罗国经.世界文明史 1987
- N. S. Davidson.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1987
- 托马斯·马丁·林赛.孔祥民,令彪.宗教改革史 1992
- R·N·Swanson. [the Pre-Reformation Church](#) 2000
- 约翰·赫伊津哈.刘军.中世纪的衰落 1997
- Martin Jones.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1995
- Peter. J Klassen. [Europe in the Reformation](#) 1979
- 爱德华·福克斯,侯焕阁.欧洲风化史·文艺复兴时代 2000
- 瓦尔特·彼得·福克斯.宗教改革时代 1998
-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1980
- 王新中.对欧洲中世纪天主教改革性质的理论思考 2003(01)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郭丽娜,陈静. [Guo Li'na, Chen Jing 论巴黎外方传教会天主教中国本土化的影响 -宗教学研究](#) 2006, "" (4)

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材料显示,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形成是十七世纪罗马为了落实天主教远东本土化政策和力排葡萄牙远东保教权而采取的一系列努力行动的结果.虽然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传教经费来源上与法国政府具有一定的资助关系,但就其本质而言,它首先是一个在组织上直属于罗马的传教团体(Association),而非宗教修会(Congrégation),其主要目的是协助传信部建立远东土著教会,因此巴黎外方传教会入华对天主教中国本土化过程曾经产生过推动作用.

2. 学位论文 曾志辉. [清末以来天主教在广西瑶族山区传播发展研究——以桂北土养槽山区教会为个案](#)

本文从区域社会文化史角度,以长期积累的中外文献史料和多次田野调查获得的大量非文本史料为基础,对清末以来位于广西北部毗邻金秀大瑶山的土养槽山区教会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作者希望通过本研究能够弥补西南民族地区天主教传播史体系中,作为唯一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广西板块”,以便让学界更加关注与东部乡村教会和都市教会发展特点有所不同的西部少数民族山区教会.作者认为,清末以来,天主教在土养槽瑶族山区的百年传播与发展,对当地瑶族教民的信仰和生活带来了深刻影响.他们放弃传统宗教信仰而皈依天主的原因复杂而多元,天主教文化与瑶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内部某些相适性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土养槽山区教会的发展是瑶族教徒与外国传教士之间内外互动的结果.天主教在广西瑶族山区本土化历程在于,通过瑶族所特有的迁徙频繁和婚姻形式等形成的“差序格局”式发展模式,具有明显的“瑶族文化特质依附性”,完全不同于东部乡村教会的“宗族依附性”,也无都市教会的官府和绅士势力的强力介入,从而使得天主教成为广西北部瑶族山区保存至今的一种区域性主流宗教.

论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尾三部分。

绪论部分即第一章,主要是从中国—区域—广西三个递进角度,对天主教史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概括性的回顾,并对选题的缘由、主要概念的界定以及史料的来源进行了说明。

正文部分按照天主教在桂北土养槽瑶族山区的传播过程、传播原因和传播特点分为三章,即文中的第二、三、四章.第二章系统梳理清末以来天主教在土养槽瑶山的传播与发展历史,分析土养槽山区教会的历史与现状,展现出当地瑶族教徒在信仰和生活上所经历的“百年变迁”.第三章是运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格拉克(Glock)为首的美国宗教学界提出的“短缺与皈依”理论来分析瑶族教徒外力因素的“短缺”,再从传教士与道士之间较量的人为因素,瑶族文化与天主教文化之间相适性的内部因素,以及作为催化剂效应的个人因素和偶然因素等四个方面来深入探讨土养槽瑶民皈依天主之原因。

第四章共三节,以土养槽山区教会嬗变规律为关注点,着重探讨天主教在西部少数民族山区本土化历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即:山区教会的发展

是少数民族教徒与外国传教士之间内外互动的结果。前两节讲瑶族教徒内在动力，最后一节讲外国传教士的外力支持。第一节通过瑶族教民村开教史个案考察来论证瑶族教徒频繁迁徙导致各瑶寨开教。第二节通过对瑶族教徒普遍存在的“入赘上门”等婚姻形式所构建起的“婚姻圈”、“信仰圈”和“族群圈”重合的婚姻网络的论述，来说明这种婚姻网络对山区教会发展的关键作用。迁徙频繁体现出教徒之间地缘远近和宗亲血缘关系，婚姻网络体现教徒之间婚姻亲属关系，以这两种血缘关系为标准形成的“差序格局”式发展模式，成为瑶族山区教会发展的独特的内在驱动力，带有明显的“瑶族文化特质依附性”，完全不同于东部地区乡村教会和都市教会发展规律，第三节则是通过外国传教士笔下的瑶族教徒和山区教会来说明外国传教士对少数民族山区教会的特别“关照”。

结尾部分包括结论、后记和参考文献。第五章即为结论部分，对本文的观点进行简单的回顾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几个未成熟的想法为笔者未来研究取向提供相应的思考。

3. 期刊论文 [郭丽娜. GUO Li-na 巴黎外方传教会与天主教的本土化历程 - 汕头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22 (1)

巴黎外方传教会是17世纪在巴黎形成的一个传教团体。从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材料分析，巴黎外方传教会直接听命于罗马教廷，肩负协助教廷传信部制衡葡萄牙保教和建立远东土著教会的使命赴远东。巴黎外方传教会入华对天主教中国本土化产生过正面影响，客观上促进了中法文化交流的发展。

4. 学位论文 [刘建平 红旗下的十字架——新中国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政策演变及其影响 \(1949-1955\) 2008](#)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首要关怀无疑是新生政权的巩固与安全。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作为国内与西方世界联系最为紧密，且意识形态与无神论政党完全对立的团体，自然也就成为新政权必须进行改造以实现对其控制的重要领域。然而，由于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群众性、国际性以及苏联公开反宗教的失败教训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断然宣布两教为敌对势力，进行公开打击，而是允许信徒在“信仰自由”原则下进行宗教活动的同时，借用中国教会历史上已经发展起来的“三自”的血统形式，全力引导和推动了旨在彻底切断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与西方世界联系的革新运动。通过此举，中共新政权不但实现了割断两教与西方世界联系以巩固新生政权的目标，而且完成了对中国教会的初步改造，最终基本上控制了这一被认为是影响其政权安危的特殊领域。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则在这种改造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萎缩和明显的分化。

本论文共包括七部分，即绪论、五章和结论。

绪论部分论述了文章的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状况、切入点和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几个重要概念的界定等问题。

第一章从源头入手，分析中国传统的反教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宗教观以及苏联宗教政策的前车之鉴等诸多因素是如何作用于中国共产党的。

第二章从新中国内外政策与教会势力之间矛盾冲突的角度切入，阐述新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的形成过程，并重点考察新政权为彻底割断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发起两教的“三自”革新运动。

第三章着重论述中共新政权对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全面清理。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以后，紧迫的危机感促使新政权对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政策日趋激进。在这一形势下，中共新政权开始全面清理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来彻底杜绝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从中国内部搞破坏的可能。控诉教会罪恶、驱逐外国籍传教士、切断源自西方各国的津贴以及接办教会所属机构等举措，无不体现出新政权的这一目的。

第四章重点考察了新政权为进一步“纯洁”教会而进行的几场重大斗争。在政府的全力引导和推动下，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三自”革新运动虽有相当的进展，但不管是基督教内，还是天主教内，都有对抗革新的势力存在。为进一步推动“三自”革新运动的发展，彻底割断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中共新政权在两教内都起了进一步“纯洁”教会的肃清反革命运动。通过此举，两教内公开对抗革新的势力被彻底打跨。第五章分析了新中国宗教政策对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影响。新政权通过一系列措施，将其权力和影响深深地植入了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内，使得原本带有极为浓厚的西方成份和亲西方色彩的基督教、天主教彻底改变了在中国的存在形式。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中国教会的阵地不仅大为缩小，而且其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本论文的结论部分对全文作结，指出建国初期新政权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极其复杂，内部充满了张力。首先，建国初期新政权基督教、天主教政策的最大诉求是通过“反帝”的形式来彻底切断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系，并在这—有着特定含义的“反帝”过程中借用“三自”的血统形式来改造教会，以使中国教会完全脱离西方世界而置于新政权的严密控制之下。其次，虽然教义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但中共新政权从统战的角度出发，仍允许信徒享有“信仰自由”。与此同时，中共新政权又提出在可能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限制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发展，即所谓“缩小(两教)市场”、“限制(两教)发展”的政策。这就使得新政权的基督教、天主教政策变得异常复杂。再次，建国初期新政权的宗教政策不管是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中国教会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对中共来说，新政权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不仅彻底割断了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而且在“三自”中完成了对两教的初步改造和控制。然而，若从中国教会的角度视之，情况就完全两样了。

5. 期刊论文 [南鸿雁. Nan Hong-yan 内蒙古中、西部天主教音乐的历史和现状 -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天籁\)](#)

2001, “ (4)

这篇文章研究的是19世纪至20世纪天主教音乐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传播、发展和交流的历史及其影响，并力图通过这种研究得出一个结论：现在的内蒙古地区的天主教音乐是中西音乐文化在该地区一个多世纪交流的成果。我的研究范围仅限于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早期天主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教情况，首先是从中、西部地区开始传播发展的。第二，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今呼和浩特、集宁以西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内蒙古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地理位置重要。第三，在研究中我发现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文化、习俗及当地民间音乐对天主教音乐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从以上三方面考虑，我认为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天主教音乐非常典型，是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

6. 期刊论文 [杨豪中. 孙跃杰. YANG Hao-zhong. SUN Yue-jie 宣化古城近代天主教建筑研究 -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6, 38 (3)

宣化古城近代天主教建筑是近代基督教建筑传入中国内地的重要见证，具有重要的文化及历史价值。以天主教传入宣化的历史过程为背景，论述了近代天主教在地处塞外的宣化地区的建筑活动和现存建筑的概况，之后以这些现存建筑所表现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建筑特征为依据，将整个宣化教区天主教建筑发展脉络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并选取典型实例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找出在各个发展时期该地区天主教建筑艺术与技术的特点，为国内此类建筑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证基础。

7. 学位论文 [龙群 长阳乡村天主教研究——以石碛墙村教会为中心 2007](#)

石村教会通过100余年来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经营，已经发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其生存状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条件迥异而各不相同。一般而言，教会与政府关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会的境遇。在经历近300年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之后，天主教已在当地民众的生活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汉文化、土家文化、天主教文化等多重文化因子共同组成了石村独特的文化景观。

在经济运作上，石村教会既有经营房地产、商业等普世教会的共性，又有面向教徒强制摊派的特点。通过与教徒结成紧密的经济关系，石村教会为自身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教育和慈善救济是石村教会所着力经营的两大社会事业。获得经济保障后，石村教会倾力兴办学校和慈善事业，并以之作为扩大教会文化影响的重要载体。通过开展文化教育和慈善救济工作，石村教会实现了自身的文化传承，扩大了文化影响，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村民的社会化进程。

在与政府关系的营造方面，石村教会倾注了大量精力，经过了晚清、民国以及新中国三个不同时代的考验。在一定时期内，石村教会由于经济文化影响的不断增强，几乎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实体。在与政府关系的处理问题上，石村教会主要还是因循天主教的传统，多持顺应政府的态度，但其顺应的尺度或者分寸又各不相同。总之，与政府关系的好坏直接决定与教会的发展。

天主教对石村民众的婚丧习俗、节庆、屋舍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打上了明显的天主教烙印，目前在村民的思想理念和日常生活中，中西合璧的影子随处可见。

8. 期刊论文 [陈月明丹. 刀福东 云南近代教会教育初探 -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35 (z1)

本文介绍了基督教、天主教以及教会学校在云南的发展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教会在云南民族地区传教、办学的一些成功经验，以及对云南发展民族教育的启示。

9. 期刊论文 [张百春, ZHANG Bai-chun 布列斯特教会合并 -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 \(5\)](#)

1596年,在当时属于波兰共和国的布列斯特召开了东正教和天主教会联合的宗教会议,史称“布列斯特教会合并会议”。这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东正教和天主教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影响至今在双方关系中仍然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10. 学位论文 [李昕 人类学视野中的乡村天主教——宁夏下营子天主教个案研究 2006](#)

本文以民族学/人类学的经典方法——田野工作法实地调查了中国西北一个偏远农村的天主教村庄。文章以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为主,结合教会组织以及当地有关政府部门提供的相关统计资料,追溯了天主教在该地的历史起源及变迁,同时也考察介绍了它在现实宗教生活中的重要断面和天主教村庄自身内部以及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系统的梳理了下营子天主教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状况。下营子天主教村庄作为宁夏境内天主教本土化的一处历史遗产,它是天主教进入中国并向本土化演进的一个阶段性成果的微小缩影。通过对这一天主教本土化的实例所做的个案调查,结合当地的历史与现实的情况,对天主教进一步完成本土化过程,到达理想程度而做出了自己的一番思考。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chkgxyxb-shkx200704004.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4f1989aa-2a79-4122-808e-9e4d00813924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